

汪 昂《医 方 集 解》读 后 记

华东疗养院 江 克 明

清代医学家汪昂,字切庵,安徽休宁人。他著有《素问灵枢类纂约注》、《本草备要》、《医方集解》、《汤头歌诀》等书,流传甚广,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尤其是后面两种书,对加深理解和帮助记忆方剂学理论,便于在临床正确应用,厥功甚伟。然因素为人习知,反不以论之,今就个人学习中的体会,略举数端,以供青年同道和自学中医者的参考。

一、使方剂学成为专门学科,自成体系

方书之祖,起自汉代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匮要略》,收方二百五十余首,为辨证施治创立了大方大法。唐有《千金》、《外台》,收方六千余首;宋有《圣济总录》,收方二万余首;明有《普济方》,收方六万余首,洋洋巨著,可谓集其大成矣。从方剂学的发展史上看,收方者日益众,注方者却不多。方之有解,起于宋代成无己、陈无择,大多是阐发仲景之方为主;后贤虽有论方者,但很少专门为方剂作出解释的。明代吴鹤皋著有《医方考》,分病列方,盛行海内,选方犹有缺陷。汪氏深感“读方不得其解,治疗安所取裁?!”是用衷合诸家,会集众说,仿陈氏、吴氏遗意,著《医方集解》,选录“诸书所共取,人世所常用”,中正平和之剂,列正方三百余,附方过之。对每个主方使用时有关的病源、脉候、脏腑、经络、药性、服法等,无不备录。

在方剂学的分类方法上,不囿于“七方”、“十剂”的旧格式,而有他新的创见。凡例云,“盖以治病之道,当治于未病,故先补养。及既受病,则有汗吐下三法,故次发表、涌吐、攻里。若表证未除,里证复急者,当表里交治,故次发表攻里。又有病在半表半里,……法当和解,故次和解。然人之一身,以气血为主,故次理气、理血。若受病之因,多本于六淫,故次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。古云百病皆由痰起,故次除痰。若饮食不节,能致积滞,故次消导。又滑则气脱,故次收涩。虫能作病,故次杀虫。至于眼目、痼疾、妇人,多有专科,……每科略取数方,以备采择。未附救急良方,则以应仓卒时之所需也”。以后方剂书的分类体系大多仿此,只不过某些章次先后稍作变动而已。

汪氏认为,“受病有原因,治疗有规则”。故《医方集

解》以治法为纲,结合六淫、气、血、痰、食、虫等因,分为二十一类,每类有概论,提示要领;每个主方先列主治病证,次详药物组成,制剂和用法;以方义解释为中心,采集历代医家的硕论名言;有数十家之多,最后以附方示人用药加减之法。一气呵成,堪为后人规范。

这样的分类方法和编写体例,从方剂学的理论高度及系统性方面都得到加强。这是一部方剂学的专门著作,促使方剂学成为一个专门学科,自成体系,由此奠定了基础。

二、从生理、病理、治法等多方面阐发理论

汪氏在《医方集解》中,对每个主方的用药意义,常从生理、病理、治法、药物效用等各个方面进行阐发。略举数则,以示其例:

1. 从生理上加以阐发,如四物汤的解释:“心生血,脾统血,肝藏血。当归辛苦甘温,入心脾生血为君;生地甘寒,入心肾滋血为臣;芍药酸寒,入肝脾敛阴为佐;芎藭辛温,通上下而行血中之气为使也”。说明四味药均入血分,分别于心、脾、肝、肾四脏起“生血”、“滋血”、“敛阴”、“行血中之气”四种不同作用。言简义明,甚得其要。

2. 从病理上加以阐发,如实脾饮的解释:“脾虚,故以白术、苓、草补之;脾寒,故以姜、附、草蔻温之;脾湿,故以大腹、茯苓利之;脾满,故以木香、厚朴导之;然土之不足,由于木之有余,木瓜酸温,能于土中泻木,兼能行水,与木香同为平肝之品,使木不克土而肝和,则土能制水而脾实矣”。从脾的虚、寒、湿、满四种病理情况分析用药,并指出补、温、利、导四种针对性的治疗方法,进一步说明肝与脾的关系,平肝有助于实脾。这对脾虚阴水的证治机理,作出了简明的阐述。

3. 从治法上加以阐发,如参苓白术散的解释:“治脾胃者,补其虚、除其湿、行其滞、调其气而已。人参、白术、茯苓、甘草、山药、薏仁、扁豆、莲子皆补脾之药也。然茯苓、山药、薏仁理脾而兼能渗湿;砂仁、陈皮调气行滞之品也,然合参、术、苓、草,暖胃而又能补中;桔梗甘苦入肺,能载诸药上浮,又能通天气于地道,使气得升降而益和,且以保肺防燥药之上僭也”。这样解释方义,对

临床用药也有指导意义。

4. 从药物效用上加以阐发,如平胃散的解释:“苍术辛烈燥湿而强脾,厚朴苦温除湿而散满,陈皮辛温利气而行痰,甘草中州主药,能补能和,蜜炙为使。泄中有补,务令湿土底于和平也”。指明本方具辛温之性,有燥湿行气散满之功,并托出了命名“平胃”的意义。

一般分析方剂的药物配伍情况,大多是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的。有的从一个方面阐发,用单叙法;有的从几个方面同时阐发,用间夹叙述法,都从理论高度加以探讨。近年各地出版的《方剂学讲义》,不但在分类体系上仿照了汪氏的模式,而且在不少方剂的解释上也采用《医方集解》的内容。

三、采集古今医家学说,反复论证

书名“集解”,表明就是收集古今医家的学说,进行反复论证的,举凡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医家的方论,如刘、李、张、朱四大家等;且“不敢重古而非今”,对当代名家,如喻嘉言、程郊倩等,择其精要者,多选录之。例如,麻黄汤后引李时珍说:“证虽属太阳,然面赤佛郁,咳嗽有痰,喘而胸满,非肺病乎?”又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后引喻嘉言说:“此证太阳之邪虽从汗解,然肺中热邪未尽,所以热虽少止,喘仍不止”。李、喻二家都以麻黄所治重在于肺,汪氏选之,是有斟酌的。他在解释麻黄汤时,说麻黄是“肺家专药而走太阳”,前后是相吻合的。同时,又引喻嘉言的解释说:“麻黄发汗,其力最猛,故以桂枝监之,甘草和之,用杏仁润下以止喘逆,正如驭马防其放逸耳”。对麻黄汤的发汗作用,并不过分强调。在该方主治哮喘证下注云:“此汤散寒利肺,病哮喘者,虽服麻黄而不作汗”。验之临床,确然如此。

又如桂枝汤后引李东垣说:“仲景治表虚,制此汤用桂枝为君,桂枝辛热发散,体轻助阳,芍药、甘草佐之。若腹中急痛,乃制小建中汤,以芍药为君,芍药酸寒,主收补中,桂枝、甘草佐之。一治表虚,一治里虚。又曰,以桂枝易肉桂,治感寒腹痛之神药。如中热腹痛,去桂加黄芩”。李氏将桂枝汤与小建中汤作了比较,由于组织配伍的不同,功用、主治也就各异。一表一里,各有侧重。更指出腹中寒痛用肉桂,热痛去桂加黄芩,这是灵活运用仲景方的经验之谈。汪氏虽说是“不业岐黄”,但从这些文献引证中可以看出其治学严谨,造诣很深。

有的方剂后面,还收录了正反两方面的言论,相互印证。如在三子养亲汤后,先引吴鹤皋说:“治痰先理气,此治标耳。终不若二陈能健脾去湿,有治本之功也”。接着又引李士材说:“治痛先攻其甚,若气实而喘,则气反为本,痰反为标矣,是在智者神而明之,若气虚者非所宜也”。这样将吴、李二家之言论并列,既教人勿偏执一

家之言,又勿致于莫衷一是。实际临床上遇见气逆而又痰盛者,三子养亲汤与二陈汤常常合并应用的。

再如桃花汤后,引录朱丹溪、程郊倩二家主虚寒的论点,反驳王肯堂、吴鹤皋二家主邪热的说法,最后汪氏自己加上按语:“此证乃因虚以见寒,非大寒者,故不必用热药。惟用甘辛温之剂以镇固之耳”。指明“甘温”、“镇固”是本方的中心,寒热之争,不无偏执。验之临床,也难印定。久泻久痢有单属虚寒者,也有兼夹湿热者;即如肠伤寒下血,也有寒热互见者,使用本方,取其“镇固”之功,是可以随证加减变化的。

四、重视药物归经,首创方剂归经学说

汪氏很重视药物归经的理论,不但是继承了,而且有所发展,从而首创方剂归经学说。他在《医方集解》中,对每个主方进行解释时,开头第一句就很醒目地标明“此××经药也”。根据各个方剂用药的不同情况,有的只归一经,如补肺阿胶散标明:“此手太阴药也”;有的归二经,如参苓白术散标明:“此足太阴、阳明药也”;有的归三经,如四君子汤标明:“此手足太阴、足阳明药也”;有的归四经,如益气聪明汤标明:“此足太阴、阳明、少阴、厥阴药也”;有的归五经,如地黄饮子标明:“手足少阴、太阴、足厥阴药也”,……等等。这样把方剂的应用与经络学说联系在一起,以经络带脏腑,成为一种方剂归经学说,是前人所未有的。

这里面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,就是方剂归经与药物归经有什么不同呢?原来药物归经是依据一味药物的效用决定的。一味药的效用单纯,就归入一个经络;一味药有多方面效用,就归入多个经络。方剂归经,当然也离不开药物的效用,但由于一个方剂用多味药物组成,通过配伍会发生变化,并且结合治法,有表里双解、攻补兼施、寒温并用、气血两调……等综合运用的内容,情况更加复杂。一个方剂用药比较集中,专治某一脏腑病证,就归一个经络;一个方剂的用药和它的适应范围涉及多个方面,就归入多个经络。特别是几个成方同时配合应用的所谓“重方”如李东垣的麻黄白术汤,“合四君、五苓、补中、平胃、麻黄、吴萸、解毒而为一方,表里、寒热、补泻之药俱备”,治证较多,汪氏就把它归入六个经络,列为“是三阳、三阴通治之剂”。

这样一种方剂归经学说,对经络学的研究,也可以提供一部分资料。

五、大方大法与单方、食疗并重,旨在发展

汪氏在《医方集解》的选方定目中,既注重大方大法,又重视单方与食物疗法。大方大法以仲景方为代表,它如刘、李、张、朱各家,内外妇幼各科,临床常用的大方大法,庶几备矣。全书二十一类方次排列,都体现

以法统方的精神。每一类为一大法,每个主方为一小法,每个附方为一变法。方外有方,法中有法,颇耐人寻味。

所收单方,如独圣散、還元水用以止血,二百味草花膏治目赤流泪,皂角丸治咳嗽痰浊,芙蓉外敷治一切痛疽肿毒等,都很切合实用。

在食物疗法方面,如芦根汤治疗呃逆,韭汁牛乳饮治疗噎膈,白蜜姜汁治久嗽,姜茶饮治疟痢,獾肝散治传尸劳瘵,甘草黑豆汤解百药毒,麻仁苏子粥治产妇老人便秘等等,都是行之有效的好方法。

汪氏从《医方集解》的编写过程中,已经看到古方的运用有其不足之处,随着时代的进展,后人是会不断充实的。他对发汗解表法,指出张仲景只“用麻黄桂枝,而全不用羌活、防风,是古人亦有未备也。故洁古制羌活汤、黄芪汤、川芎汤,海藏制神术散、白术汤,皆用羌活、防风以代之”。推而言之,近年编出的《方剂学讲义》,将《温病条辨》的银翘散、桑菊饮收入为辛凉解表法的代表方,使解表法益臻完备,也充实了汪氏当时选方之不足,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。

六、以精炼的词句编成歌诀,作为基本功

汪氏先著《医方集解》,十年以后,嫌其卷帙浩繁,携带不便,乃约束成《汤头歌诀》一书。《医方集解》是收集前人的方论,加上自己的见解,诠释各种方剂,分析用药意义,着重于理论上的阐发。《汤头歌诀》以简短的词句,押好音韵,便于背诵,是从加强记忆上花功夫的。

新书出版消息

伤寒直格 伤寒标本心法, (金)刘元素, 估价0.50元, 1982年10月出版, 人民卫生出版社。

前书上卷论述十干、十二支的脏腑配合,又四类、九气、五邪、运气有余不足之为病,及七表八里、脉候等内容;中卷为刘氏对伤寒疗法的独特心得;下卷除选载仲景名方外,并附自制效方。后书上卷从伤寒、伤寒、中暑、中湿开始,一直述及劳复、食复诸证的证候、治法,对伤寒“标”与“本”论述较为深入;下卷选载仲景以至刘氏所制的效方六十余首。

本草品汇精要, (明)刘文泰编著, 估价5.75元, 1982年11月出版, 人民卫生出版社。

原书计有十部,分上、中、下三品,共收载新旧药物1815种,续集仍为十部,编写体例同原书。每一药品首引《神农本草经》、《名医别录》、《本草拾遗》以及唐、宋各家本草的有关记载,详述药物功用、主治、异名、产地、采集、色味、制法、禁忌、真伪等。本

试举四君子汤歌诀为例,字句不多,概括性很强,于此可见一斑。歌诀云:四君子汤中和义,参、术、茯苓、甘草比;益以陈、夏名六君,祛痰补气阳虚饵;除却半夏名异功,或加香砂胃寒使”。短短六句,概括了主方和附方五首。既详其药物组成,又列举了方剂的效用,同时还带到适应证候。这对初学方剂的人来讲,帮助是很大的。

我的家乡,有这样两句话:“熟读王叔和,不如汤头歌”。是说熟读王叔和的脉诀,只能了解脉诊情况,不如背诵《汤头歌诀》临床上据证选方,解决问题,便利得多。

在学习中医专业过程中,对方剂学这一门课程,除了课堂讲授加深理解以外,历来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,就是记不牢。通过背诵《汤头歌诀》,是可以帮助记忆,得到巩固的。在临床实习带教中,发觉能背熟《汤头歌诀》者,处方用药组织严密。这就是基本功扎实的好处。

过去学中医,没有方剂学讲义,大多是采用《医方集解》和《汤头歌诀》作为练好基本功的必读书。目前虽然有了新编的讲义,内容作了精选和充实,系统性有了进一步加强,但汪氏二书仍不失为重要的参考书。正因为他的影响较大,后人有不少著作也沿袭其体例。如吴仪洛的《成方切用》就是从《医方集解》的基础上加以扩充的,严苍山的《汤头歌诀续集》即由汪氏歌诀增辑而成的。

书较《本草纲目》成书尚早七十余年。此书曾由商务印书馆出版(1956年)。

岱山堂类辨 医学真传, (清)张志聪、高世栻编著, 估价0.40元, 1982年12月出版, 人民卫生出版社。

前书为张氏与学友及其弟子探讨医理、讲论方药、钻研学术的专题论集,其内容广泛;同时采用了医论、医话的格式,深入浅出,引人入胜。后书为张氏弟子高氏所著,为高氏之讲学记录。与前书虽有相似之处,但确有独到见解。

备急千金要方(影印), (唐)孙思邈编著, 估价精装4.50元, 平装3.60元, 1982年10月出版, 人民卫生出版社。

全书收方五千余首,尚包括针灸一千余条,以论带方,中肯允当,为后世推崇。该书还收载了唐以前医药文献的珍贵资料,如郭玉、范汪等各家之著。今据日本江户医学影摹北宋刊本加句影印出版,并附印“考导”于后,以供备用。

(本刊不办理邮购新书事宜)